

中国古典大学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

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刘宝存

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《大学一解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，溯其源流，实自西洋移植而来，顾制度为一事，而精神又为一事。就制度言，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，就精神言，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，而事有可通者。” [1]

现在人们研究中国大学，常把其历史追溯到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），或者1895的北洋大学（天津大学的前身）、1896年的南洋公学（交通大学的前身）。实际上，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，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，有着探索高深学问的传统。在西方大学理念传入中国之前，中国就已经出现过成均、稷下学宫、太学、书院等探索高深学问的机构，一些史学家称它们为“大学”，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大学最早的国家或最早的国家之一。[2] 从探索高深学问的传统、培养高层次学生的职能等方面来看，这些“大学”和今日的所谓大学有相通之处；但从大学制度上来看，它与今日的大学又有很大的差异。为区别起见，我们暂且称之为古典大学。

中国古典大学的理念基础是儒家的教育思想，而集中讨论大学理念的儒家著作首推《大学》。《大学》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相传为汉初儒家思孟学派戴德、戴圣叔侄所作。宋代朱熹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，将其与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称“四书”，其中《大学》位居四书之首，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。《大学》开宗明义地指出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对此，著名学者

南怀瑾认为,《大学》中所谓“‘大学之道’的道,也是从形而上而来的理念”,“大学之道”实际上就是“大学理念”。[3]那么“大学”又是什么呢?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指出:“‘大学’一词有二义,一指大学问,一指大学校。《大学》之‘大学’,只指大学问,不指大学校。”[4]因为大学问不是在修业只有数年的大学校就能完成的,而是终身教育的过程。《大学》的中心在于其“三纲领”和“八条目”。所谓三纲领,就是前面所引的“在明明德,在新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思孟学派认为人天生就是善的,因此,“大学”的任务就在于“明明德”,即把人天生的善良德性发扬光大。“大学”的第二项任务是“新民”,即修己立人,推己及人,化民成俗,更新民众。“大学”的第三项任务在于“止于至善”,“至善”即善的最高境界,即永恒的、绝对的真理。“止于至善”,也就是要去追求永恒的真理,达到真理的最高境界。所谓八条目,就是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从三纲领和八条目的关系看,三纲领提出了“大学”的目的和任务,而八条目则是实现目的、完成任务的全部过程和步骤。与《大学》同是《礼记》组成部分的《中庸》和《学记》则更多地从治学方法上阐述如何探索大学问。如《中庸》中提出了“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”的治学方法。《学记》中则提出了豫、时、孙、摩的“大学之法”和长善救失、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《中庸》、《学记》是《大学》所体现的“大学”理念的具体化和补充。

涂又光给《大学》以高度评价,认为《大学》中所说的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新民,在止于至善”,是“贯通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全过程的总规律”,是“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的最佳表述”。“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有成均、私学、太学、书院、大学,尽管各有特征,也都遵循上述总规律。”[5]在古代中国,儒家思想一脉相承,无论是董仲舒、朱熹还是二程、颜元,其“大学”理念都未能摆脱《大学》的影响;无论是太学、书院还是某些具有古典“大学”性质的私学,也都遵循着《大学》以及《中庸》、《学记》所确立的“大学”理念。

汉代硕儒、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董仲舒(公元前179-104)提出“罢黜百

家，独尊儒术”和“兴太学”的主张，对后世古典大学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文化学术上的统治，从而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。他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，并成为汉代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。从此，尊孔崇儒的政策，一直为以后2000多年的历代统治者所奉行，对文化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。正是因为此，中国的古典大学才缺乏西方大学探索“普遍学问”的精神。也正是因为此，当中国建立近代大学时，著名教育家蔡元反复强调“大学者，‘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’之学府也”，[6]要求“对于各家学说，依各国大学通例，循思想自由原则，兼容并包。无论何种学派，苟其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，即使彼此相反，也听他们自由发展。”[7]在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政策下，董仲舒主张在中央设立太学，在地方设立庠序。所谓太学，也就是大学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，则作太。如‘大宰’俗作‘太宰’，‘太子’俗作‘太子’，周‘大王’俗作‘太王’，是也。”董仲舒认为设立太学的目的在于求贤养士。他说：“养士之大者，莫过乎太学。太学者，贤士之所关也，教化之本原也。”[8]根据董仲舒的建议，汉代于公元前124年开始设立太学，教师称为博士，学生称为博士弟子。到元代，太学合到国子学中，便不再有太学了，太学前后存在了1000多年。

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考试制度使中国的古典大学有了新的发展。科举制度和官办的太学系统相互强化，一方面刺激了太学规模的扩大，另一方面却使太学走向腐败，使读书人醉心于功名，无心致力于学术。于是，在五代时期，就出现了聚徒讲学、探讨学问的书院，至宋代书院兴盛，比官办的太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最著名的书院有四个：白鹿洞书院、石鼓书院、应天府书院和岳麓书院。其中，白鹿洞书院由宋代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朱熹（1130-1200）所建。朱熹认为，教育或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明人伦。什么叫“明人伦”呢？就是要发展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种德性。他认为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这五种德性是人性中所固有的，要通过教育或学习使这五种德性得到发展，使人或自己成为圣贤。

朱熹依据古代教育的经验，主张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。儿童八岁

入小学，主要教以“洒扫应对进退之节”、“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”以及“礼乐射御书数之习”等一系列具体的礼节、道德规范和知识，培养“圣贤坯模”。到了15岁就应进大学学习。与小学教育以学习和行为习惯的训练为主不同，大学教育的重点是使学生增长知识，懂得“事君事父兄”的道理，钻研穷理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并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。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，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深化，它们是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，小学阶段所学的事与大学阶段所学的理是前后一贯的，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。

在朱熹看来，大学的最佳教育机构在于书院。在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，定有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其中蕴涵了朱熹的大学理念。《揭示》的主要内容包括：①五教之目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②为学之序：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③修身之要：言忠信，行笃敬。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。④处事之要：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⑤接物之要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个“揭示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指出了书院的教育目标、教育方法、教育纲领等。朱熹首先指明书院的教育目标是“明人伦”的五教。为学就是要讲明这个“义理”，以穷理，以体道。再进一步提出，修身处事接物之要，作为实际生活和教育的原则。由于朱熹的影响，白鹿洞书院成为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。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后又被朱熹揭示于岳麓书院楣间，成为《岳麓书院揭示》，以后抄录在各地的学校和书院之中，成为各类学校共同遵守的指导方针。到清末刘廷琛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，仍以“朱熹‘白鹿洞揭示’……榜示全堂。”[9]

初立时书院的组织很简单，主持人也即是主讲人，一般没有其他管理人员和机构。主持人称洞主、山长、堂长、院长等。学习内容为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但在教学上有许多不同于官学的特点。（1）书院多为藏书、研究、教学三结合的机构。宋代书院继承唐代书院藏书、修书的传统，很注重藏书。南宋因印刷术进步，有的书院还刊印书籍。在书院讲学的不少是名师大儒，他们一面讲学，一面研究著述，创立学派。如朱熹、陆九渊、吕祖谦就是三个不同的学派。（2）书院具有一定自由讲学

之风。书院受禅宗讲学的影响，多设于山林胜地，公开讲学，四方学者都可来听讲，并邀请其他书院的学者来讲学。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朱熹邀请与他不同观点的陆九渊来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，首开书院“讲会”制度的先河。在讲学中欢迎质疑问难，展开辩论，有些“百家争鸣”的精神。不过他们都是在儒学范围内的论争，都自诩是代表了儒家的道。所以理学又称道学。（3）教学以学生自己钻研为主。书院的教学一般以学生自己读书钻研为主，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，鼓励学生提出问题，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或疑点进行讲解，重视学生的品德修养。因此，书院的师生关系比较融洽，感情相当深厚。至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，光绪皇帝下令全国书院一律改为学堂，于是存在1000余年的书院改制大学堂、高等学堂或者中学堂。

中国古典大学的理念，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物，其中有一些糟粕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使古典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局限于儒家学说，不利于其他学派的发展，影响中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，与今日大学“普遍学问”的理念是不相适应的。中国古典大学以官办为主，行政色彩较浓，这种理念对今日大学的官僚化、行政化仍有一定的影响。

但在中国古典大学的理念之中，也有许多理念至今仍有其借鉴价值。首先，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。中国古典大学的核心理念就是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在这种理念之下，大学教育重视明人伦，讲修身，强调人格的养成。在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，重视人文教育，谋求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统一，已成为大学教育的发展趋势。古典大学的人文主义传统，仍然具有积极意义。其次，自由研究的追求。太学作为官办的学校，以培养统治人才为主要职能，并没有养成学术研究的传统。但在书院则形成了自由讲学与自由研究的传统，书院的形成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有相似之处，都是围绕者著名学者自然形成的，目的就是探索学问，培育人才，而不是升官发财。在近代“兴西学”的过程中，书院改制学堂，大学区域行政化，自由研究的风气渐淡。对此，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感叹道：“所可惜的，就是光绪政变，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，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。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，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。……书院之废，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

幸事。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，将不复现于今日了。” [10] 1925年留美归来的任鸿隽、陈衡哲夫妇曾联名发表《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》，希望以中国的书院精神与欧美的大学制度相结合，构建中国的大学。 [11] 如果真能把书院精神引入现代大学，对于革除现代大学的一些弊端当意义重大。

The idea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

[1] 刘述礼、黄延复编：《梅贻琦教育论著选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，第99页。

[2] 在12世纪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前，欧洲历史上曾形成一些类似于大学的研究高深学问的中心，如古希腊的雅典、古罗马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亚、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等，有些史学家也将这些研究高深学问的中心称为“大学”。

[3] 南怀谨著：《原本大学微言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，第30页。

[4] 涂又光著：《中国高等教育史论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，第36页。

[5] 涂又光著：《中国高等教育史论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，第539页。

[6] 蔡元培著：《蔡元培全集》（第3卷），中华书局1984年，第221页。

[7] 高平叔编：《蔡元培教育文选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，第244页。

[8] 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。

[9] 刘锦藻：《清朝续文献统考·学校考十三》。

[10] 胡适：《胡适学术文集·教育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，273页。

[11] 任鸿隽、陈衡哲：《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》，《现代评论》1925年第2卷第39期。